

广西上思县
那荡乡僮族社会历史調查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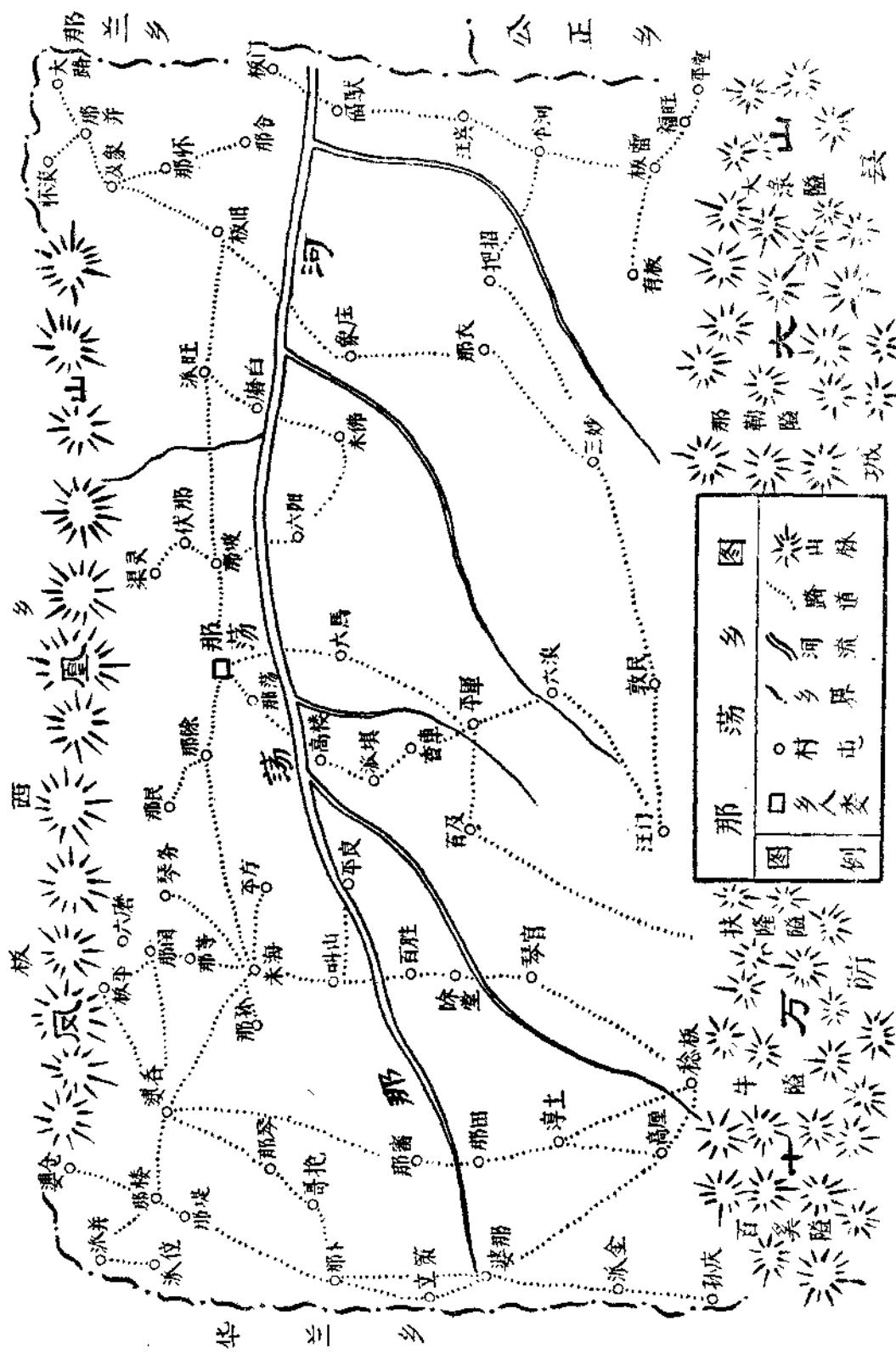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編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說 明

《那蕩乡僮族社会历史調查報告》是我組李干芬等同志于1958年10月間前往調查寫成初稿，最近李同志又進一步加工整理付印。由于水平有限，錯誤可能不少，敬祈讀者指正。

編 者

1963年8月20日



目 录

壹、一般情况	(1)
(一) 地理	(1)
(二) 民族	(2)
(三) 历史沿革	(3)
(四) 言语	(3)
貳、經濟概况	(4)
(一) 农业	(4)
(二) 手工业	(19)
(三) 林业与副业	(21)
(四) 商业	(21)
叁、政治概况	(23)
(一) 旧社会的黑暗統治	(23)
(二) 解放后的政治运动	(24)
肆、文教卫生与生活习俗	(26)
(一) 文化教育	(26)
(二) 卫生情况	(27)
(三) 宗教信仰	(28)
(四) 居住	(29)
(五) 飲食	(30)
(六) 服飾	(30)
(七) 节日	(31)
(八) 家庭	(31)
(九) 婚姻	(32)
(十) 裹葬	(33)

壹、一般情况

(一) 地理

那蕩乡位于上思县东南部，是一个山区地方，东与广东防城和本县的公正乡、百包乡相邻，南接十万大山，西界华兰乡，北至凤凰山。东西相距40公里，南北20公里，东西长而南北狭，总面积約800平方公里，其中高山地带占总面积 $\frac{4}{5}$ 左右，可耕地仅占 $\frac{1}{5}$ 左右。

乡里有明江上游的支流自西北向东南貫流，名为那蕩河，发源于十万大山脉的板稔屯附近，另外还有五条小溪在乡境汇合。那蕩河流出乡境后轉向东北流經县城的思阳乡，再折向西南流入宁明县，出龙津县属上金区与左江会合，全长約200公里。河床浅狭，滩石頗多，不能行船，只有在妙乡以下一小段可通木船。历代以来，本乡人民就依此取得灌溉农田及順水运出木材之利。

在全乡范围以内，北部附近凤凰山一带村落密集，一般相距仅五至十华里左右，乡之南面靠十万大山麓一带，村落稀疏，一般十多二十华里才有一个村屯。乡里最大的村庄如那坡屯住戶达百多家，最小的平坊屯仅三户住家，一般的都有二、三十户。那蕩圩是本乡唯一的圩場，也是乡人委所在地，更是文化的中心。據說清代初期，村落稀少，土地荒蕪，及至民国时代，村庄才漸多起来。

境内山巒重迭，交通很不方便。清初以前山关岭塞，車馬難行，清中以后，那坡屯世家地主江泰然假施慈悲“獻資”修了五条通往广东防城、东兴的隘路，还在那白、百包、那蕩等小河上搭了三座桥樑。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而客观上对交通起了一定作用。自此以后，人馬行走才稍为通便。到辛亥革命以后約二十年的1930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曾修了一条由县到乡的公路，全长60多华里，成为本乡唯一的陆路干线，可通县城出南宁。大跃进以后进一步兴工修理，大概不久即可以通行汽車。

本乡通往广东的道路，主要依靠扶隆、珂瑰、那勒、百奚及牛隘等五条隘路。历代以来，人們翻山越隘到防城、那良、东兴等地买卖，有时外地商人也挑来一些貨物换取土特产。

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主要的稻谷，一年可种植三糙，其次是木薯、紅薯、芋头、三角麦等杂粮，經濟作物的花生也不少，茶油产量居全县第一，除自給外还可以向外输出。其它作物如玉米，豆类等比較少。矿产以十万大山邻近的汪門一带藏量較多，其中鐵矿藏量估計在万吨以上，含鐵量50%以上。錳矿和硫矿也有发现，其它矿藏現正在勘探中。森林资源在十万山和凤凰山也有若干，目前国家正在十万大山附近的汪門、三妙、敦民一带兴建三个林場，若干年后，本乡将成为我区的重要林业基地之一。

畜类主要是耕犧用的牛只，其它如馬、羊等很少。依于山区优越的自然条件，曠野宽广，綠草常青，畜牧业之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力。

本乡地处亚热带区，但有北海海风調剂，所以并不算炎熱。一年四季，大概春季暖和，气温一般在7—26度摄氏左右；夏季白天炎熱晚間凉快，气温在26—37度之間；秋季凉爽，气温在22—33度之間；冬季較冷，气温在5—20度之間。总的來說，一年气候良好，除在十

万大山附近每年出現三九天的冰冻現象外，其余沒有什么結冰的情況。

正由于高山密林，氣候溫和，所以雨量相當充沛，全年總降雨量在五百公厘以上，其中夏秋雨量較多，冬春較少，適宜于農作物的生長。

(二) 民族

全鄉現有僮、漢、瑤、京等四個民族，共5404人，其中除瑤族261人，京族52人，漢族100多人外，其余全是僮族，占全鄉總人口95%左右。瑤族自古以來就居住在鳳凰山那等屯的有20多戶，解放後在上方山搬出來定居于渠零屯的有20戶。漢族、京族多是近代由廣東和越南來的，他們都與僮族雜居，京族全是女性，據說是解放前被騙拐來賣給僮、漢族為妻，沒有單一的家庭組織。

本地僮族來源，據調查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說祖宗原居山東和江西省，漢馬援、宋狄青向南用兵時才先後南來。這些說法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隨征的士兵留居下來演化了的漢族，一個可能是由於歷史上的民族壓迫而偽造家譜，但總不能當作僮族源流。二說祖宗原籍廣東南海（以那坡屯江、劉、楊、周四姓為代表），明末清初才遷來，據說江家是做官被貶來的。從江家神台上的世系表看已有十四代，在時間上基本符合，看來這些人可能也是演化了的漢族。三說是近百年才陸續由上思搬來（以黃、韦兩姓為代表）。其余大部份姓氏，沒有家譜可查，也不知來自何方，他們都說自己是土人，看來可能是土著民族。總而言之，不管是外來抑或土著，現在都講僮語，生產和生活習俗已完全相同，都是僮族，這是長期以來共同勞動、共同生活的自然融合的結果。

根據七、八十歲的老人家說：本地在清中葉以前，山荒林密，人口稀少，近几十年來，生產有了一定發展，人口也逐漸增多。在过去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社會里，窮苦的勞動人民為生活所逼，溺嬰的現象很流行，一家養育兩三個子女後就不再養了，生下來就採取溺殺辦法，尤其是女孩被溺殺的更多，嚴重地影響了民族的繁榮發展。

歷史上僮、漢、瑤、京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還是好的，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是主流，生產技術上的互相學習，各族之間互通婚姻，象那除屯馬景會（僮）娶瑤族婦女為妻的不乏其人，交為朋友的也不少。在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社會里，他們遭受共同的厄運，因而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但是也應該看到，在階級社會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居於統治地位，他們挑撥民族關係，散布民族歧視，在一定程度上給人們以影響。例如在稱呼上，僮族自稱為“板人”、“本地人”、“土人”，而漢、瑤族則稱僮族為“土佬”、“土狗”，含有極大的侮辱性。相反地，僮族稱漢族為“呆佬”，稱瑤族為“板衣”（山人之意），也包含了侮辱的意思。

解放以後尤其是大躍進以後，隨著私有制的消滅，集體經濟的發展，人與人及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有了很大改變。各族之間稱兄道弟，呼為同志朋友的已成普遍，瑤族從山上搬下平地來住，沒有房屋，僮族人民為他們搭蓋，不懂耕田插秧僮族兄弟就來指引，田地缺少合作社就分配給他們，勞動工分也得到適當照顧，新的團結互助、友愛合作的民族關係正在形成和發展。這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勝利。然而也應該看到，由於歷史上的影響，在僮瑤族關係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

1956年高級合作社時候，渠零瑤族生產隊私分產品，社里發現後于1957年分配時扣除墊還，瑤族社員收入少而大為不滿，認為僮族欺侮了他們。在此同時，由扶綏縣來了一個瑤族

坏份子，肆意挑拨，说什么入社不自由，不能随便去打猎，你们入社干吗？而邓、李两家的上层人物又加油加醋，煽风点火，终于1958年正月，瑶族全部退出了合作社，进行单干。

1958年二月间，渠零瑶族把附近村边的合作社的田地全部种上东西，事情发生后乡长去商量解决，但瑶族不理，瑶族上层头人李桂才还四处扬言说：我大过政府，用什么商量！毛主席是爱我们的，就是你们乱搞。自此以后隔阂更深了，四月间天旱，那一带的田地水源都给瑶族独占去了，两族社员争争吵吵解决不了。僮族社员说，等他们稻谷黄熟时集体去割取，如果愿意入社就给他们，否则不给，看他们如何办？埋下了更大的争端。

几年来党和人民政府给予当地瑶族极大的照顾，救济发放贷款，一次又一次，而瑶族中的坏份子却故意的歪曲煽动，说什么政府连年贷款造成他们欠债，由山上搬下来变成了贫困户，以前在山上还有吃些……，使瑶族群众对政府不满。

总之，这里的瑶族对政府不信任，对僮族也有极大意见，人民公社成立初期他们不参加，大办钢铁他们也不去，工作人员到村中他们全都避开，只留下妇女和小孩。这些现象必须及时解决，否则将给社会主义建设、民族团结带来不利。

（三）历史沿革

据说，那藩乡在清代称为那柳堡，等于后来的五个团，设有团总，1911年以后，改为凤凰团，至1929年新桂系军阀李白黄统治时期改为那藩乡那藩村，1949年底解放后沿用那藩村名，1952年土地改革后改名那藩乡。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合百包、板西等乡为凤凰人民公社。

（四）语言

僮族有自己的语言，但历史上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本地僮语和其他地区的僮语一样，对大自然的称谓有自己的音调，如天、地、日、月、花、草、树木、山、水、河等等，称法与汉语完全不同，但在一些新的名词中如汽车、飞机、合作社等等，则借用汉语称法。语法有与汉语相同的直述语如“去洗衣”僮语称“俾塞步”，也有不同于汉语的倒装语法，如我们这个具僮族称“恩现楼”。

在僮文没有创造前，僮族都以汉语同音的字来記事，特别记录山歌的唱法更普遍，其中也创造了一些以汉字的形声合成的土俗字，如田称“帮”，山写成“岜”等等。解放后的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给僮族创造了僮文，并逐步在本地推广，培养了一批僮文教师，每一个生产队（连、排）都有一个教师，学习僮文的空气高涨，计1958年上半年参加学习僮文的人数达1200多人，已脱盲的344人，现在僮文扫盲工作正在全面推行。

貳、經濟概況

(一)農業

(1)土地與農作物

本鄉屬山區地帶，山多田少，畲地也不多，土地的種類大致可分為水田、旱田、畲地等種。水田面積6667畝，占全鄉土地面積46.4%；旱田5908畝，占總面積41%；畲地1775畝，占總面積22.5%，加上魚塘319畝。總共為14350畝。水田一年四季均有飽水，可耕種二至三穡禾苗；旱田沒有水源，靠天下雨，故又稱“等天田”，遇上干旱則收成無望，因此每年僅種一穡稻谷，以後再種上麥類；畲地多在山坡上，全是種雜糧。

土地改革以前，本地雖于1931年時國民黨政府進行測量過田地，以畝作為計算單位，但群眾仍沿用老一輩保留下來的，以“称”為單位計算習慣，直至土改後才改稱畝。

依於土地情況，作物播種的種類繁多，主要的有稻谷、三角麥、玉米、鴨腳粟、木薯、紅薯、芋頭、大薯、花生、黃豆等等，以稻谷為主，一般家庭每年食稻谷6—8個月，其餘則為雜糧（地主、富農階級全年都是食稻米為主糧），貧苦之家以雜糧為主食的時間多至8個月，而最低限度的生活仍無法解決。紅薯是雜糧中最主要的一種，藤蔓可以作豬飼料，薯作人食，人們種的較多，每年每家收入達一、二十担，也有多至四、五十擔的。

玉米的種植據說在七十年前才由瑤族地區傳授過來，因本地畲地多在山坡上，土質瘦瘠不宜種植。芋頭、木薯、大薯等也是近百年來才由瑤族地區傳授來，因產量高而工也簡，所以種植的極普遍。

花生和黃豆傳說在四、五代以前才由扶綏縣屬地區買來種，一年一收，黃豆春種秋收，花生則春種夏收。

(2)生產力

組織與分工：本鄉的僮族在勞動的組織和分工上面，與外地僮族有所不同，近百年來背工互助式的集體勞動已不存在，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貧困戶沒有牛的則向地富之家租用，租不到時就以人挖代替牛耕。如那坡屯周連有老人家在民國初年時佃租官田來耕，因年歲不好交不起租被捕去坐牢，迫不得已將家中仅有的一頭牛卖掉還債，結果無牛代耕，只好用人力鋤耕了好幾年，辛苦勞累且不在話下，而工作進度更慢得可怜，每天全家人勞動而播不下十斤種子，往往因為這樣趕不上季節而影響收成的。象這種情況在本地的貧窮人家里實在太多了。

勞動分工主要表現在家庭分工上面。除挑擔一項為男女共同的勞動外，其餘農活或家務分工是非常明顯的。一般說來，男勞動力多管犁耙田地及裁縫衣服等活路，女人多管拔秧、插田、耘田、割谷、挑水、煮飯、洗衣、織布、做鞋、帶孩子等等，既繁且重，一年到頭整天忙碌也應付不來。男性在家庭中是全家經濟的支配者，女性多居於從屬地位，封建家長制

极为浓厚。

劳动时间的长短以田地的远近有所不同。近田操作一般早上劳动四小时，中午回家休息，下午再劳动四小时就可以了，如果田地远达10里以外，则带上午餐，整天劳动，直至黄昏才返家。要是犁耙田地则上午下午各犁三小时，中午休息放牧。由于生产力低下，所以劳动效率不高。贫苦人家儘管终年劳碌于农耕上，仍然难得求得温饱生活。

正因为这样，所以本地农家剩余劳动力是不多的，只在每年十月秋收完毕以后，穷苦人们才有机会到防城担盐博取工钱，或到山上砍柴烧炭出卖，以求得些钱帮补家庭生活的不足。

大跃进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集体食堂、托儿所曾兴办起来，大批的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投入到工农业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力量。

生产工具：本地农户使用的生产工具，大致有下列几种。

犁——僮语称为“ta”，是翻犁田地的主要工具，沿用已久，形式向来没有多大改变，木架和铁铧都是本地人自己打制，过去每把犁买价500铜仙（约等于70斤谷价），单铧咀则须50斤谷价。每把犁能用多少时间看具体情况而定，有的用三、五年，也有半年九个月的。

解放后新式的五三步犁、双轮双铧犁等已在本地推广，全乡计有三十多把。这些新式犁有部份是向外地买来的，部份是本地铁匠仿制而成的。新式犁的工作效率比过去旧式犁提高很多，但过去几年因技术未过关，用的不普遍，甚至有些放着不用，近来这种情况已基本改变。

耙——僮语称“per”，有木耙和铁耙二种，耙田耙地一般均可使用。铁耙因价格昂贵，穷人极难买到，只有地富之家才能以1500—2000斤谷来买。木耙是所有耕田户都会制作，所以穷人都使用木耙。耙的形式与外地没有多大差异。

鎌——僮语称“cot”，与汉区的大镰相同。沿用的时间已不可考，据说在十多代以前人们就已使用。凡是镰田塍、整水沟、镰地、镰草都使用它。本乡铁匠可以自制，每把卖价约40斤谷价。这是种田人家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

刮——僮语称“get”，是一种小手锄，相当轻便，除草、松土都用它。沿用年代已久，本地铁匠均能打制。

鋤头——僮语称“got”，形式与外地同，挖地多用之。

刀——僮语称“len”，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钩头的，一种是平头的，砍柴多用钩刀，砍竹削篾多用平头刀。

其它如斧头、镰刀等，差不多每家都有，式样与外地相同。

所有这些工具，是本地赖以生产的主要工具，也代表了本地的生产力水平。解放后特别是大跃进中，大力进行技术革新，进一步推广新式农具，本乡也相继建成了农具厂，生产了各式步犁、插秧机、稻秧船、打谷机、玉米脱粒机、耘田器、牛车等，对本地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

生产技术：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大致可从下面诸种作物的栽培情况看出来：

稻谷——历来本地的稻谷一年都种两季。第一季种的是旱稻（又称六禾谷），每于年节过后即开始翻犁田地，二月天撒播秧苗，二十天左右秧苗长约四、五寸时，再将秧苗拔起移植在田上。一般稻田均进行三犁三耙才插秧，以后每隔20天左右耘田一次，经过二、三次耘田以后即待收成了。第二季是在六月夏收完后，马上将田翻犁，重复耙好，直到禾草稗除尽，即行再插。这里的插田规格老班以来就有了一套。一般深耕4寸，株距、行距在八寸至

一尺（市尺計）左右，肥料施放的不多，禾苗长的不太好，产量也不很高，而計收300斤左右，两糙也不过500斤。解放后精耕細作、加工加肥等技术逐渐推广，大跃进后小株密植等技术正在开始試驗推行，单位产量逐年有所增长。

玉米——多年以来玉米的种植都是这样：每年冬天农闲时节即将畲地翻犁好，来年农历正月間将地耙平下种。种法有用牛犁开壠，也有用手鋤开畦点播的。一般行距一尺五寸，株距一寸，每株放一抓肥后再点种，每坑下籽三、四粒，一亩施肥十担八担不等。种下一个月左右，等幼苗长至四、五寸即去疏苗护理，每株留下健壮的一苗。經過两三次的除草培土后即可收获。习惯上玉米地不間种套种其他作物，要增产只从增加复种次数着手——收玉米后不再种其他作物。解放前玉米在本地不是主粮，农家种的不多，收入超出二百斤的很少，而且多用作猪飼料。解放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順利完成，土地得到統一使用，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現在平均每人每年可收干玉米粒80市斤左右，数口之家可收几百斤，增加了人們收入。

芋头——种植的历史虽仅几十年，可是发展很快，解放前許多貧戶都当作粮食来吃，所以种的很普遍。一年中的一、二、三、八、十一月均可播种。这里土地肥沃，山畲岭地都可种植，即使不施肥也可收成。芋头地也不間种其它作物，收下芋头再种紅薯。几年来以发展粮食作物为主，芋头种植的不多了。

紅薯——一年四季都可种植，四季都有收成，一般家庭每年都有几十担收穫，放在楼棚上炕火烟，不易腐烂，味甜好吃，可当粮食。入社以后种的更多，技术也由以前的小行改为大行，行距五尺左右，壠高二尺，寬三尺，爭取高产丰收。紅薯堆种的达二千多堆，堆长6尺，高3尺多，肥料充足，看来产量更高。

三角麦——又称荞麦，有冬麦和春麦二种。冬麦在白露以前种上，十二月收。春麦在立冬前下种，三月收。种前先犁耙好土地，把种子和灰肥攪拌撒在地上（亩下肥八、九担），再翻犁一次使泥土盖住麦种。以后不中耕，三个月即可收成。入社后采取密植方法，产量有所提高。

花生——这里种的是小花生，又称三秋豆，其实每年仅一糙，春种夏收。下种前把地耙松耙匀，开壠放肥点种，壠间距一尺多，寬尺多，深6寸左右，株距七、八寸。下种后再犁一次盖上种子，以后再除草培土一二次，好使花生下蔓。收成时将藤蔓拔起即得花生。比起大花生用手鋤挖省工得多了。

从上述諸种作物栽种技术看来，这里的生产有其特点，只是在一坵土地上增加复种次数，要求在多次种植中增加收入，而間种、套种沒有采用，土地还没有做到合理使用，农业生产技术还大有提高的余地。

过去，迷信思想对本地农业生产发展有很大障碍，他們在一年农事中有許多禁忌：

凡是自己的祖父母、父母逝世的那一天，在三年内逢上这一天全家都不能去生产，否则認為种下的作物全部枯死。

每年开春雷鳴的第一天，認為是雷公刚由天上降临，一切生产必須停止，若触犯天就要旱。到九月九那天，認為是雷公回天宮过年，家家戶戶必須蒸糯米饭拜送，否則第二年雷公不来，生产难搞。

每当旧历年年初一，每家戶主須用布将稻谷、玉米、木薯、芋头、紅薯、大薯、三角麦、黃豆、花生等种子包好，拿到畲地上埋起来，上面掛着白色紗紙条。他們認為这样以后下种才不用选择良辰吉日（逢上忌日例外）。埋种回来时順手摘一把木叶回来，插在門口，叫“采青”，以示今年丰收。

諸如此類情況，在解放前仍盛行。解放後幾年來已逐漸根絕了。

至于對待自然災害來說，多數任其自然，沒有什麼積極辦法。例如：

蟲災——是本地主要災害，以頂心虫、捲葉虫為最，解放前差不多每年發生一兩趟。每當蟲災發生，人們認為“神蟲”下降，無法除絕，只是聽天由命，束手無策，以致顆粒無收。如光緒20年時發生的蟲災，蔓延極廣，那蕩鄉各村屯的禾苗尤幸免，災重的如那坡屯附近的禾苗全被吃光枯死，結果用火燒田，顆粒無收，受災較輕的也都是大幅度的減產。解放後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除推行選種、剷光田基等工作外，還進行藥物整治，因此幾年很少有蟲害發生。今年九月間河邊附近一帶的禾苗受洪水淹過一次後發生了捲葉虫害，但經社員們大力扑殺後已全部滅絕，作物受害不多。

旱災——本鄉靠近十萬大山，山深林密，氣候溫和，還有北海的海風調節，雨量相當充沛，旱災較少。但是有些年頭氣候反常，也會發生過嚴重的旱災。如歷史上著名的1901—1903年（光緒27—29年）三年的大旱，草木枯萎，人們吃芭蕉心、樹皮為生，賣妻鬻子或逃荒他處的不少其人。1925年（民國十四年）也發生一次比較嚴重的旱災，按旱情本來是可以搶救的，但由于反動政府不重視民生，廣大群眾只是求神庇祐，結果也沒有收成。

解放後，黨和人民政府積極領導人民群眾起來防旱抗旱，據統計全鄉興修了八個小型水庫，可灌溉田四、五百畝，改變了部份旱田為飽水田，保證了糧食的逐年增產。今年上半年本地出現了幾十年來罕有的旱災，全鄉受旱田地面積占90%以上，但在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發動全體社員起來抗旱，最後战胜了旱災，奪得了50%以上的糧食收成，基本解決了口糧問題，大大顯示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人們反映說，如果是解放前將會出現飢殍滿道、強盜猖獗、家散人亡的慘狀，但現在沒有這樣情況了，多虧黨的功勞呵！從這些事實中，也大大改變了人們對災害的看法，樹立了人定勝天的改造自然的思想。

水災——本鄉境內有一條那蕩河從西向東貫流着，歷來都沒有什麼整治疏浚，而地處十萬大山之麓，暴風雨時常發作，風雨之後就是洪水泛濫，所以河床兩岸的低田，常受洪水淹沒，水淹後往往造成失收減產，而當時的反動政府不去理會，人民受害不淺。解放後黨對人民的生產生活，給予極大的重視，不但注意農田的防災排水工作，而且每于洪水过后，馬上組織群眾搶救，如今年九月中旬洪水暴發，全鄉十三個大隊受災面積達三千多畝（其中中糙921畝，晚糙2097畝，紅薯136畝），經過了一場搏鬥，晚糙934畝，中糙152畝獲得了搶救，加上水退後逐漸扶苗、追肥、護理，作物生長良好，縮小了災情。

隨着整風反右的勝利，去冬今春以來，本鄉也掀起了農業生產大躍進的高潮，積肥、水利、車子化、田間管理等工作，一個接着一個，出現了史無前例事迹。全鄉搞衛星田、試驗田作示範，提出了爭取全面豐產的規劃。茲將全鄉今年生產情況列表於下：

那蕩乡冬种春收統計表

社別 種類 數量	紅薯		紅豆		三角麦		其它		註
	亩	产量斤	亩	产量	亩	产量	亩	产量	
那堤	80	16,284	11	403.3	55	2,272			
那卜	40	16,000	3	120	40	1,600			
婆眷	75	19,010	3	89	55	1,434	7	1,381	
那串	90	30,000	5	250	80	2,500	15	5,000	
那閨	50	24,561	11.5	566	51	2,762	4	1,690	
米海	60	25,000	1.2	40	70	2,100			
百及	31	13,000	2	70	70	1,700	5	2,000	
那蕩	100	50,000	5.5	120	35	4,000	20	8,000	
那坡	120	60,000			100	3,000	20	8,000	
六浪	50	15,000			70	2,000			
板旧	347	17,000			249	5,000			
把招	65	35,746	2.5	100	71	2,126			
大路	70	28,000			60	2,000			
合計	1,178	349,601	44.7	1,958.3	31,001	32,494	71	26,071	

那蕩乡春种夏收統計表

類別 產量 社別	早 稻		紅 薯		綠 豆		玉 米		黃 豆		註
	亩	产量 (斤)	亩	产量 (斤)	亩	产量 (斤)	亩	产量 (斤)	亩	产量 (斤)	
那 堤	530	106,515.4	51	5,200	6	248	75	420	11	139	玉米 黃豆 因受 旱災 重所 以产 量极 低。
那 卜	260	50,000	20	2,000	40	1,600	5	100	1	40	
漿 吞	461	91,246	10	1,500	2	80	0.5	30			
那 审	416	98,276	20	2,500	15	600	5	100	3	20	
那 閨	390	92,490	24	3,000	8	320	6	392			
米 海	257	47,660	10	2,000	5	250	3	90	3	50	
百 及	243	66,980			6	246	7	150	5	210	
那 蕩	428	95,316			16	500	24	1,500	22	250	
那 坡	546	118,026	40	4,800	8	200			10	67	
六 浪	243	58,222			2	100	6	100			
板 旧	895	155,951	101	20,000	32	1,400	53	1,000	28	660	
把 招	746	144,738					10	321			
大 路	421	91,115	30	3,000							
合 計	5,836	1,215,535.4	306	44,000	1405,544	194.54	203	83	1,436		

那蕩乡夏种秋收估产表

社 別	中 稻		晚 稻		紅 薯		豆 类		芋头	木薯
	亩	产量 (斤)	亩	产量 (斤)	亩	产量 (斤)	亩	产量 (斤)	产量 (斤)	产量 (斤)
那 堤	419	250,000	530	350,000	412	160,000			15,000	1,000
那 卜	173	65,000	260	100,000	50	30,000			1,000	150
婆 春	114	44,160	467	120,000	120	48,000	6	120	4,000	4,000
那 串	416	200,000	423	250,000	140	150,000	7	220	1,000	1,000
那 閨	230	110,400	400	164,000	69	30,000			4,300	6,000
米 海	190	76,000	240	96,000	130	130,000			7,500	500
白 及	306	120,000	189	80,000	63	80,000	5	200	2,000	
那 蕩	666	360,000	428	360,000	126	126,000	17	400	1,000	
那 坡	782	400,000	601	350,000	178	178,000	10	300		
六 浪	305	138,000	243	133,900	71	35,000	3	160	3,000	2,500
板 旧	790	200,000	818	300,000	415	200,000	60	650	8,000	1,200
把 招	815	240,000	812	260,000	226	150,000			4,000	500
大 路	480	200,000	421	200,000	63	80,000			1,000	1,000
合 计	5,686	2,403,560	5,832	2,763,900	2,026	1,377,000	108	2,050	51,800	17,850

从上表看来，儘管今年发生了严重春旱，但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集体化的优越条件下，人们战胜了旱灾，夺得了粮食。据统计，全年粮食产量仍然有所增长，以稻谷为例：早中晚稻总产量6382995斤，比上年增长10%左右。

(3) 生产关系

据说在200年前（或者更远一些时间），本乡的土地已相当集中，就老人所知道传下来的事实在已有七代人（约170年以上）。现将解放前后的情况写在下面：

甲：解放前的情况

土地占有：

官田——又称学田，两百年前已存在，分布于那蕩、那坡、那閨、米海、六浪等十多个村屯里，面积约900称（150亩左右），年产量70,000斤以上。这些田历来都是由团董掌握，交

給农民佃耕，收貨幣地租，有清一代租入完全用于每年10月祭“孔廟”之需。每年十月择定“吉日”，召集所有全县的科举“老爷”到县城，割猪杀牛会宴，到会者还分得二、三斤肉类。辛亥革命前后，废科举，兴学堂，学田收入拨入学堂使用。到了1931年新桂系軍閥李、白、黃統治时，他們极力搜刮軍費、清粮賦，将所有田地进行普遍的測量，后来由当时經營人梁煥犹出通出卖，每亩价值銅仙5,000枚，共得銅仙80万枚左右。梁是本地惡霸，也是土豪劣紳，素來橫行作恶欺压百姓。这次变卖田地給他开了“生財”之道，他以經營之权，勾結官家，將該款私吞肥己将近大半。稍后一些時間，經營人周作思采取同样手段，貪污舞弊，至此，这些款項无形中化为烏有。

庙田——面积約300称（合50亩左右）、产量达20,000多斤，向来也是由农民佃耕，利率40%，多按田地大小規定租額。相传这些田的来源，是百多年前六浪屯有一馬姓者，因子女不孝順而把私产献为庙产（詳見宗教土地廟）。这些田的变卖時間与官田同时，田价略高，每称谷种面积（合3亩）卖价40—60元光洋不等。所得的款同样为梁煥犹、周作思二人私吞肥己。他們后来成为本地的大地主。

会田——是农民群众合夥捐資买来作为打斋聚会費用的田。據說每捐銅仙1,000枚为一份，参加若干份沒有限制，有的地主豪富之家占上十数份的，如那坡屯有会田30亩左右，而地主江明賢一家就拥有20份之多。会田也由农民佃耕，按田土的好坏交定額的貨幣租，用于十月庙会之用（本地有三年一大祭，一年一小祭的习惯），余下款則繼續买田放租。全村性的訴訟或出奇匪亂使用的彈薬也从其中开支。抗战爆发以至于解放前夕，因时局不定而会田租入多被某些私人仗勢吞瞞，那坡屯的会田租全被江华英侵吞去，其死后他的儿子不承認而成了糊塗賬。这些田直到土地改革才分給貧戶耕种。

宗祠田——也称“蒸嘗田”或“祭山田”，一般是以姓族为单位共同占有，以定租办法出租，租額与一般田租相同。收入作为三月清明或九月重阳祭祖山之用。本乡各村的大族如附楊屯的楊家、那坡屯的江姓、那除屯的馬家均拥有20亩左右，祇有那些小族姓如周、刘、陈、陆等家，族小人少，买不起田。这些田都是由有权有勢的“族长”所控制。

官紳地主田——本地的官紳地主，都占有大片田地，據說多是百多年来以巧取豪夺手段霸占得来的。事实表明，当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以后，土地已大量集中了。茲将本乡几个較大的地主占有田地及其发家情况例举于下：

①那坡屯江泰然，生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成年后搞盐贩生意，經常来往于广东防城。每販來盐一担賺两担利，連續經營了27年，到他45岁时发了財，有了錢，大兴土木，鼎建房屋，置买田地，不久拥有3,500称田地面积（約当于250,000斤产量，合600亩）除了迫使家奴及佃戶代耕200称外，全部出租，每年单田租收入100,000斤以上，家中牛馬成群，光馬匹就有四、五匹，牛十數头。家奴五、六人（其中男二、女四），男家奴长大后給娶妻，但生下子女世代为奴，如黃三成、黃亞杰两兄弟就是世代为奴。女家奴长大后卖給別人为妻取錢，再买入小的的女孩蓄養为奴，一去一來，从卖买女奴中不知榨取了多少錢財。

江家不单占有大片土地，而且拥有为数相当大的經濟林，如八角、茶油林，每年收入前者2,000多斤，后者达1,000多斤。

江家田多、錢多、勢大，家中常拥有万几千元的銀幣，稻谷吃几年也吃不完，是本县当时有名的大地主。據說江泰然曾用五万元銀幣来修桥搭路，开通广东防城的扶隆、百奚、那勒、河曳、牛隘等五个隘口，搭了百包、那白、那当等三座桥，为其发家致富的目的出发而假施慈悲，騙取群众信任（客观上对交通有利），他发财后被委为那柳堡总（团总），依于

政治勢力和經濟力量（其祖先江汉秋是貢生），不单农民被压榨得连头也抬不起，就是上思县官也怕他三分，每过那坡都下馬參拜。江泰然每遇出门不是坐轎就是跨馬，前呼后拥，儼如土官威风，直至光緒21年（1895）85岁时死去，打了四昼夜斋，日夜爆竹连天，县官和各地秀才老爷都来凭吊，用錢數以万計。

據說江家“生財之道”有三：一是上面說的做盐販生意一本二利，逐年积累，利生利，由小而大；一是放高利貸，江泰然发家后每年放貸的銅錢达100万枚，每千錢50斤谷利息，十數年間一变成了大富翁。由此看来，他的发家史真是“从头毛到脚根，每一个毛孔都染透了斑斑的血跡”。

到了他的儿子江昭瑞时又中了文秀才，繼續着团总职位，家財比之于其父并不逊色，相反地依于“一人成佛，全家皆仙”的传统势力，大力搜刮民財，捧上压下。他的孙子江明远、江同声又先后中了秀才（前者是文秀才，后者是武秀才），明远繼任团总职位，威勢更斯利，敲榨勒索，魚肉乡民，无所不干，奢侈淫蕩更是前无先例，每每大飲大喝，嫖妓宿娼，每隔三两个月就来南宁带回娼女数人玩弄。至此家財略有下降。到其第四代孙时，明远生下三个子，（同声絕嗣），各分家立业，而且沒有取得政治权位作后盾，加之資本主义經濟的冲击和豪华生活花費，家財日趋衰退，土改时仅有一个迁到上思居住的成为地主，其余二人均系富农。

②那等屯磨現琼：在清道光年間已是家財万貫了。到太平天国革命时代，他乘世事动荡，清朝地方官吏已是喪魂失魄之际，野心勃勃，独据一方，在佛子成立佛子府，自称府官，强迫附近的平福、那蕩、叫磨、佛子等許多乡村百姓，向他納糧繳賦，服劳役，把百姓的土地沒收为己，設衙門，养兵差，儼如土司統治与上思厅官相峙数年，直至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才垮下台来。但是也沒有誰敢动他的分厘产业。到其子磨常隆时已是同治年間，但仍有产业田8000称（合1200亩）左右，年收谷达50多万斤，成为当时上思大地主之一。

清末民国初年，他的孙磨粹华，不掌握政权，只是务农，人口日益增多，加之淫逸生活所耗，曾卖去100亩左右，但家勢仍极旺。粹华又生三子，分成三房，每家占有三、四百亩出土，土改时都成了地主，磨美才、磨有才現在仍被管制中。

磨家发家主要是磨現琼时掠夺霸占得来，佃耕磨家之田的人，均受額外的劳役剥削，在凤凰山上的一个瑶族村，就是由他家招来的“农奴”村，該屯廿多戶人家，都为磨家服劳役，大凡磨家的耕田、收割、打柴、割草、抬轎、埋葬……等等，都要这个屯的瑶族为他服役。每年一个家庭为磨家服劳役的达一个月以上。除此之外，还有程度不等的超經濟剥削。

③那坡屯陈兆吉，清末时其祖父經營生意起家，拥有田土200称（合40亩）左右，除自耕10来亩外，其余出租，取定租50%，此外还以200元光洋放貸，每10元取利息谷300斤，每年光收入債谷达6000斤。到陈繼承先业时，又兼做了粮賦征收員，貪污舞弊，将公糧用来放債，加上每年放銅仙債，銀元債，总共每年高利貸收入达数万斤，比其老子时更发了横財。家中每年蓄养长工二、三人，短工剥削更是經年不息。此外还将十多头牛租出取谷，将家資变卖部分經營杂貨店生意。土改时成为一个官僚、地主、商业資本家三位一体的剥削者。

④那坡屯刘兴文，清中叶时，其祖父仍然还是一个穷得連屋也沒有住的貧困戶，后来才通过巧取豪夺手段，括得了一些家資，建筑了房屋。到清代末年，刘識了些字，当上了私塾教師，积蓄了銀錢，买了田地。到了民国初年他又巴結了上級官员，当上了团总，利用政治暴力，騙上瞞下，欺压群众，如民国十四年（1925年）时，早魃施威，农作物失收，伪政府發布停止征收粮賦令，但他却向农民摊收，結果发了大財，买了250称（合50亩）稻田，除少部份

自耕外，大多出租給农民佃耕，收取谷租，而且每年还放貸500元光洋，剝取实物利息。估計田租和放貸收入的稻谷，每年达20000斤以上，轉帳数年，一变成了暴发戶。到其子刘世祥时，正是撤团改乡时代，依于政治余威和經濟勢力，通过阿諛逢承的手段，又当上了十年的伪乡长，貪餓暴歛的嘴臉比之于其父亲真是有过之而不及。貪污勒索，抽丁拉夫，半官半賊，样样都干。凡是应征的壮丁，只要交上十古洋紗就可免征，应夫役者同样可以贿赂免役。多少穷家汉被送去当蒋匪帮的炮灰。在此同时，还四处购买枪枝弹药，养了大批乡警，以护送关隘商客为名，唆使乡警偷牛刦路，謀財害命，其則坐地分赃，发了大財，添置了大片田土。解放前由于与伪政府发生矛盾，在貪赃枉法的判决下予以枪决。但其家財田土絲毫沒有变动，其后代在土改前拥有1000称（200亩）土地，成为那坡屯大地主。

从上述几个地主发家史看來，說明了封建統治者与土地結合起来了，他們既是統治者又是土地占有者。个别从經商发家的地主，实则說明了商业資本与土地結合的通例。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貧者无立錐之地，据調查，那蕩乡在清末至民国初年有40%的农戶沒有土地，变成地主的佃戶。就土改前統計的材料看，解放前貧富悬殊的情况已瞭如指掌了。

那蕩乡土改前土地占有統計表

項 目 別 階 級	戶 數	人 口	土地占有情況		
			水 旱 田 (斗)	坡 地 (斗)	小 計 (斗)
雇农	109	225	628.3	85	713.8
贫农	625	1,062	32,069.8	2,081	34,150.8
中农	266	629	31,031.8	1,524	32,555.8
富农	41	251	11,907	475	12,382
地主	42	244	20,238.6	359	20,597.6
其他	23	56			
外乡业主在本乡的田			284		284
公田			668	21	689
合計	1,106	4,765	96,828	4,545	101,373

据上表看來，全乡人口4765人，耕地面积101,373斗，地主人口244人，占有土地20,597.6斗，占20.3%。富农人口251人，占有土地12,382斗，占12.2%。中农人口629人，有土地32,555.8斗，占31%。贫农1062人，有土地34,150.8斗，占33%。雇农225人，有土地713.8斗，占4%。若以人口平均，则贫雇农占有土地已是微乎其微了。这是历代以来，他們被压迫剝削的根基。

封建压迫和剝削：

历史上那蕩乡的僮族人民遭受了封建地主經濟的或超經濟的种种剝削和压迫，最集中的